

曹金玲：其实一直有创作的。那时候写《拯救——戒毒所日记》，我还不是一个标准的编剧，可能还是作为业余爱好在尝试。后来，就读相关专业之后，给自己定的标准就比较高了，希望能做得更好。

目前我在拍一个纪录片，关于两位戒毒志愿者的故事。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戒毒所，离开以后，偶尔做戒毒志愿者的工作。这个题材很久之前就想拍摄了，现在经过《武汉日夜》积累了一些经验，希望能把这个纪录片拍好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当警察的经历，让你接触特别多的社会事件，朴素、真实，已经成为你创作中的一种底色。创作文艺作品，必须沉入生活。针对眼下若干浮夸、可笑的影视剧，请谈谈你的一些体会吧。

曹金玲：我在想我们该如何定义这份“真实”呢？这个“真实”，倒不是单单指生活层面的，它是一种艺术之真，不由理性控制。科学、理性，会带给人类经验与知识，可是，人类的大脑里，还有很大的空间是需要情感去填充的。而满足这种情感需求的，是艺术。比如有的人爱音乐、有的人爱绘画、有的人爱影视……作为影视工业的从业者，我们要抓住这一点，从情感切入。

打个比方。一个水壶，它是不是真的水壶不重要，它咕嘟咕嘟在炉子上烧着的时候，白色的水汽不断冒出的时候，让人能够联想到某个事件、某种氛围，从而投射情感，这才是重要的，就是由事物及人的形式（无论真实与否），引发观众主观上的情感真实非常重要。“真实”指的不是水壶即水壶，碗筷即碗筷。戏剧都有一个“假定性”的前提，而只要在这个假定的前提下让观众感受到有真实的感觉，产生了情感，就抵达了、发生作用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从警察到编剧再到导演，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你认为文艺作品的“编导一体化”是最理想的状态吗？

曹金玲：需要大量的补课吧，这是比较大的困难。

转行前后，我做了一些努力。本硕博的专业，一直在换，每个阶段，转换起来还是挺累的。博士读美学，几年的时间有了美学理论的基础，后来国外深造都是围绕《莫尔道嘎》，进修方法论等等，目标很明确，都是围绕着怎么做出剧本，怎么拍出这个电影。

待电影拍完，剪完，我重新回想，在导演专业上，我的知识储备是不够的，还需要不断地去探索视听语言，不断地提炼、分析，不断地充电。所以今年一年我都在学习、都在补课。有



曹金玲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工作了数年，这段经历促使她创作出了《拯救——戒毒所日记》。



曹金玲的剧情片导演处女作《莫尔道嘎》，讲的是一位伐木工人与最后一块原始森林的故事。

时候怕自己懈怠，一个人读那种艰深、干涩的专业书籍会读不下去，还专门组织了研读班、“工作坊”，来的也都是导演、制片人等等行业内的人，互相督促，围着一起读书、拉片、一起讨论、切磋。

说到“编导一体化”，这是我的理想状态。我原来当过警察，养成了一种喜欢做万全准备、确保万无一失的习惯，但是当导演不太容易“万全”，即便预案很多，现场也总有各类突发情况，让人焦头烂额。这种时候，导演同时是编剧，适配性就更高，调整起来就更顺畅，省下了合作的时间成本、默契成本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即将在国内公映的、你的剧情片导演处女作《莫尔道嘎》，讲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内蒙，一位伐木工人与最后一块原始森林的故事。注意到你喜欢写“人”，从个体的独特命运去探问生活的意义。为什么迷恋“微光”？

曹金玲：主要是打动我吧。这份情感的触动特别强烈，支撑我和主演、主创团队用几年的时间去完成它，希望这份触动能通过影片传达给观众。2021年，《莫尔道嘎》入围了24个国际电影节，获得纽约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等5个奖项的鼓励，也荣幸成为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一带一路电影周开幕影片。在很多线上线下与世界各地观众的映后交流中，大家都看到了这份“微光”，这是作为主创最开心和欣慰的事。我也很期待今年在国内的上映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接下来想尝试哪些新题材、新类型？

曹金玲：我想尝试的还蛮多的。2022年，可能会拍一部传记片，也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，我继续努力学习、实践，继续加油。